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程中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是张闻天把从苏联学习的理论运用到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践的时期,是他从“左”倾走到摆脱“左”倾以至反对“左”倾的时期,也是他与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观点逐步走向基本一致的时期。这一时期张闻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他在长征中作出贡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作了积极的准备。

[关键词]中央苏区;张闻天;毛泽东“左”倾军事路线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5-0060-05

1932年底,张闻天化装成富商乘船离开上海到达汕头,经大埔,过上杭、长汀,于1933年1月中旬到达瑞金。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在1934年1月中旬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在接着举行的“二苏大”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直到1934年10月10日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梅坑出发,踏上长征路。前后虽只一年零八个月,但无论对张闻天来说,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时期。

中央苏区时期,是张闻天把从苏联学习的理论运用到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践的时期,是他从“左”倾走到摆脱“左”倾以至反对“左”倾的时期,也是他与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观点逐步走向基本一致的时期。这一时期张闻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他在长征中作出的贡献作了思想

和组织上的准备,也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作了积极的准备。

一、张闻天对中央苏区经济构成和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论述,为日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出东北经济构成和东北经济建设方针提纲作了准备

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等文章中具体分析了红色区域的六种经济成分,在发展中考察了它们的地位、作用。他指出,在苏区,地主经济在土地革命后已“完全消灭”;农民小生产的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小生产者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它“目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带有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小手工业“占着主要的地位”,它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其发展“是不可避免

[收稿日期]2016-06-02

[作者简介]程中原(1938—),男,江苏无锡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

的”,也是“有利的”;国营企业“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当然“带有社会主义成分”,其中有重大意义的是“国家银行和各种营业的组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说还没有”。^[1]

在此基础上,张闻天提出发展生产、鼓励流通的方针。认为党和政府的任务要尽量扩大生产,“来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该采取的方针是“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要采取扩大消费合作社、加强粮食调剂等措施“以便商品的流通”;还主张“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

张闻天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苏区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工商业的发展,苏区内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即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此,我们并不反对,“并且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指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张闻天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限制、竞争、斗争。^[1]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经济思想和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结合实际学习和运用列宁的经济思想形成的。可以说,是他运用列宁经济思想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的一例。

同时,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经济思想也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经济状况、中国社会性质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的。1931年在上海,张闻天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6月15日,他写成《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以刘梦云为笔名,发表在神州国光社1932年4月出版的《读书杂志》第4、5期合刊上。文中指出,在中国的农村,“封建的剥削占统治的地位”;“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中国革命“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2]有力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和中国的托派关于中国已经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兼任马克思共

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校长,在该校系统授课。1934年1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就是他讲课的记录。第一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系统分析和阐述了从清末到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说明现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这篇讲稿拓展和深化了他在1931年对中国经济性质的论述。1936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安塞会见埃德加·斯诺时介绍此书“仍算是现有最好的一本书”。^{[3]P283}

研究和了解了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上述经济思想,我们就不难看出,1948年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是对他中央苏区经济构成和经济工作方针政策论述的发展和深化。张闻天的这个经济提纲,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的经济建设方针的制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之一。而追根溯源,其根源是在中央苏区。

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一系列关于反对“左”倾错误特别是“左”倾军事路线的文章和报告,为他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会后写出《遵义会议决议》作了准备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献是以张闻天在会上作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的意见,并结合会后情势的发展写成的。这个文献系统总结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张闻天为什么能够在会后的行军途中写出这一光辉文献?从他在中央苏区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遵义会议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至长征前夕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若干思想观点以至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内容同《遵义会议

决议》直接有关的文章至少有以下诸篇:

1.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此文写于1933年11月21日,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的当天。发表于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斗争》第36期,署名洛甫。文章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严肃地批评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张闻天估计到,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我们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我们的任务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他嘲笑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把订立这种作战协定的谈判当做儿戏,指责他们“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4]

2. 《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这是在广昌失守当天(1934年4月27日)写成、发表在5月1日《红色中华》上的署名洛甫的社论。此前,张闻天已经对李德、博古的军事方针持不同看法。文章对“堡垒主义”和“分兵把口”提出批评,说“分兵把口,同堡垒主义,是紧密的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与此差不多同时,在总结广昌战役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同博古发生了激烈争论。^[5]

3. 《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

这是发表在《斗争》第64期(7月14日出版)上的社论,写于1934年6月24日。张闻天“最尖锐地提出同这种‘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指出,如果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一时的狂放的革命性”,那么,同样的,“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可能的!”张闻天鲜明地批评党内流行的一种观点“‘左’倾总要比右倾好。”而且坚定地提出“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文章列举并分析了“极左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在检举行动中、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上、

在经济政策中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要求每一个同志了解“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过左倾向是违背‘党与苏维埃的整体利益的’”。激励大家要有“勇气”反对“极左主义”。并说“不敢反对极左主义或对于极左主义表现容忍与姑息的同志,不能称为布尔什维克。”^[6]在此之前,张闻天在为《红色中华》撰写的两篇社论中严厉批评了在肃反和对待地主富农方面的极“左”错误。

4. 《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这是张闻天1934年7月26日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报告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斗争》第76期(1934年9月7日)。张闻天尖锐地批评“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说将地方武装用来“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提出“这种公式必须立刻粉碎,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从堡垒,从空机关走向群众,去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他认为,闽赣党的第一任务是“武装广大的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苏维埃政权”。^[7]

5.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这篇社论于1934年9月26日写成,署名张闻天,发表在9月29日的《红色中华》上。这篇社论被称为动员长征的“战略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进行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它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红军为什么要进行战略大转移的问题。张闻天从总结反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入手,批评了“左”倾进攻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对“进攻路线”作出新的解释“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那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讲进攻、不准谈退却的教条。张闻天又正面提出我们的方法论原则“根据于每一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8]据此,社论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斗争方式,并以十分醒目的表述,肯定了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缩短战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比较明确地

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

张闻天进而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他自觉地运用这一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指出,那些机械论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或者是保卫苏区,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或者是放弃苏区,放弃苏维埃的革命,而退却逃跑。……个人的英雄主义拼命主义,或者失败主义,逃跑主义,是这些机械论者所找到的仅有的出路”。这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发展轨迹的第一次概括。张闻天又指出,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取得某些胜利时,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放弃了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残酷的斗争”;一旦遇到阻碍或停滞,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与前途”,在“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时”,就会“走到灰心绝望中去”。在这里,“‘左’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表现了他们相反的一致”,其症结就在于“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8]

由此可见,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的思想已经同毛泽东的思想基本一致,上述一系列文章为他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和会后写成决议奠定了基础。加之在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一路行军一路交谈,特别是过了老山界以后,一起同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斗争,进一步领受了毛泽东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样,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在遵义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完成会议的委托,在“反报告”的基础上综合会上意见和会后变化情况,写出《遵义会议决议》,完全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毛洛合作”的发展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央苏区后期党内矛盾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博洛矛盾”逐步加深,“毛洛合作”不断发展。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洛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他们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1931年2月张闻天回国后,在上海临时中央期间对毛泽东总的说来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在那篇批评“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中,他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战略战术;^[9]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他赞成宁都会议的决定,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据张闻天在1932年10月6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过,当时他同毛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

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张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触和了解多起来。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六届五中全会后的人事安排,洛甫感到是博古等人用的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把洛从中央排挤出去,一方面把毛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从1934年2月起,洛甫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洛采取对毛尊重的态度,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1934年1月至2月,洛在他主编的《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还效法毛的做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与毛联名合著出版《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共同采取反对态度。在1934年8月1日瑞金遭遇敌机轰炸后,毛洛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居住。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互相关心。由于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在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住处前的黄桷树下进行了坦诚倾心的交谈。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称得上是亲密战友的阶段。长征出发前以张闻天署名发表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实际上是中央红军进行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它十分明确地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采取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说明张闻天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的认识,

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已经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在长征前夕,张闻天已经走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

长征路上“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形成及这个集体一路交谈,毛洛之间思想观点更趋一致,感情上也更加亲近。过了老山界后又一起与“左”倾错误领导展开斗争,这就为

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见,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他从“左”倾走到摆脱“左”倾以至反对“左”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实践和理论,为他在长征中作出的贡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作了积极的准备。

[参考文献]

- [1]张闻天.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N].斗争(第11期),1933-05-10.
- [2]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J].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第五期合刊),1932.
- [3]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4]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N].斗争(第36期),1933-11-26.
- [5]洛甫.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N].红色中华,1934-05-01.
- [6]洛甫.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N].斗争(第64期),1934-07-14.
- [7]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N].斗争(第76期),1934-09-07.
- [8]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N].红色中华,1934-09-29.
- [9]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N].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1932-04-25.

Zhang Wentian'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CHENG Zhong - yua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is a period when Zhang Wentian applied the theories he learned from Soviet Union in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soviet area, a period when he broke away from and fought against the leftism error, and a period when he gradually reached agreement with Mao Zedong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Zhang Wentian'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this period made him ready in idea and organization for mak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Long March, and also made him ready for making contributions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Zhang Wentian; Mao Zedong; leftist military route

(责任编辑:贺文赞)